

■新作聚焦

熊召政历史小说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： 雄关漫道 英雄传奇

□马琳

在《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》一书中，文学批评家乔治·斯坦纳说到，“史诗小说”往往都“描写了航程”。熊召政的新著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以厚重笔墨书写了一段远征、一场命运的跋涉，是一次伟大的“航程”。从大漠草原到玉龙雪山，从蒙古部族到南国大理，未来的元世祖忽必烈穿越数千里，历经半年余，在漫长的远征途上经历了心灵的淬炼与成长，在“航程”中建立起“天下仁人”的治国韬略。远征途中，激烈的角逐故事依次上演，真实的历史人物、虚构的鲜活形象，共同描绘出逐鹿天下的历史表情。一位跋涉在草原、山河间，逐渐建立起天下观、仁道观的未来帝王跃然纸上，在中国历史的沧浪里划出一条民族融合、文明互鉴的弧线。

这种“在路上”的书写，正是作品最核心的叙事姿态。这个“路上”，既是地理意义上的跋涉，更是精神意义上的成长。忽必烈是元世祖，是大一统王朝的建立者，也是从草原走向中原、从马背走向庙堂的重要历史人物。写好这样一位伟人并不容易。历史人物书写之难，即在如何让一个早已被历史命名定位的人，重新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，将其还原为一个有血肉、有犹疑、有抱负也有孤独的人。熊召政是一位深具历史纵深的作家，善于在王朝兴替、人物命运与时代风云之间铺陈叙事，以雄浑笔力将人物带回历史现场，写出权力波澜中的人心幽微。在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中，忽必烈从北境走到西南，从草原迁至山地，从熟悉的骑射世界进入陌生的烟瘴之境。他既要统率军队、安抚人心、判断局势、识别奸佞，还要在征伐与宽仁间寻找平衡，每一步都惊心动魄。为了让读者看到英雄是如何在“路上”获得成长的，作品让忽必烈从历史名词中走出，成为一个可以被读者感知、理解甚至共情的人物。这种“可感知”首先体现在他的性格反差之中。

在众王储中，忽必烈一向被兄弟们看作是一个怯于提刀相向的书生。但他心爱的王妃察必夫人最懂得他的内心：“您是一个有野心的人。”这个“野心”并非指狭隘的帝王宝座，而是广纳群雄、睥睨天下的宏伟格局。正是在“路上”，忽必烈不断开阔着“不要站在蒙古看天下，而要站在天下看蒙古”的胸襟。伟大英雄的命运，总由无数普通人的呼吸、奔走、迟疑与牺牲共同托举而成。小说通过丰富的群像塑造，烘托出忽必烈的犹疑、判断与抉择。围绕在他身边的谋臣、武将、地方势力、敌方人物以及远征途中的普通士卒，各自怀揣着不同的立场、恐惧、欲望与选择，共同构成辽阔丰满的人物图卷。这是一场关于公元1252年的政治书写，他们是个性的人，更是“典型”的人。“他们既属于所在的时代，又超越所在的时代。”

书写一个伟大英雄，必然关联着宏大主题。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写“南征”，意在写“南和”。“我的南征军，不但不替天行道，还必须是不要杀戮为乐的仁义之师。”小说要塑造的，正是这样一位力图建立“天下”和合秩序的一代帝王。作家因此选择“南征大理”这一极具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展开叙事，“行路难”为忽必烈的“天下观”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忽必烈要面对的不只是南征途中的山川险阻，更是权力、责任、传统、天下与自我之间的重重考验。因此，南征既是一次军事行动，更是一次精神远行、一场人格淬火。“南征”不断深入，忽必烈也越发意识到：真正的王者，不只要胜利，还要秩序；不只要疆域，还要人心。

复杂的性格属性不能由作者直白道出，细节故事才最为动人。书中第四部分写了忽必烈与李尔桑的和解。西夏曾被蒙古灭国，复仇的种子一直深埋在西夏后裔木雅人心中。为平息西夏后人的复仇火焰，忽必烈历经周折救出西夏太子李尔桑的爱子，以关切的怀柔战略，“埋葬了西夏最后的仇恨”，化干戈为玉帛。如果



说成吉思汗打开了草原帝国的辽阔边界，忽必烈思考的则是：把征服转化为治理，把武功转化为文治，把草原力量带入广阔的天下秩序。作为一部表面上以征伐为核心故事的历史小说，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的精神内核，是对和平的深切呼唤。

南征路途犹如一方阔大的舞台，一幕幕惊险的征伐故事相继上演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认为，小说存活下来这一事实本身就依赖于小说作者能否掌握戏剧要素，而戏剧性恰是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重要的形式特征。“大历史”落到“小场面”，传奇故事的戏剧性为人物设置了符合历史情境的选择困境，“天下”主题与伟岸形象得以实现。南征道路漫长艰险，山河变换，节气更替，人心杂处……对于远征军而言，每一道山岭、每一条江河、每一片瘴雾，都可能成为看不见的敌人。漫长路途为小说提供了不断推进的戏剧张力，外部的山川险阻与内部的精神压力交织在一起，使南征成为一场不断升级的考验，也构成了小说的两条叙事线索。表面上看，南征大理是蒙哥大汗交付给忽必烈的一次军事任务：穿越川滇烟瘴、金沙江峡谷、苍山险隘，面对一路的自然阻隔与军事抵抗。深层来看，在南征路上与哈布和林物理距离的暗角较量，是重重政治势力，因此南征又是一场政治考验。此外，小说的戏剧张力还在于，大理是蒙古绕开南宋正面防线、打开西南战略通道的关键。因此，一座山国的存亡牵动的是天下棋局的变化。忽必烈既要保持蒙古骑兵的威慑与强悍，又要展现出超越部族的统领能力。由此看，作品最有力的冲突并不止于“蒙古与大理”的外部对抗，而在于忽必烈自身：他必须在马背血性与天下胸襟之间找到新的身份。小说写“路”，更在写“局”。对于忽必烈而言，选择无处不在：是急进，还是缓图？是强攻，还是怀柔？是以威压服人，还是以信义收心？这些选择构成了作品最意味深长的戏剧冲突。传奇扎根在历史大势之中，推动了人物成

真正的历史小说，贵在于让旧事重新获得体温，让人物从年代的尘埃中走出，带着迟疑、勇毅、孤独与远见，重新站到读者面前。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以厚重笔墨书写了一段远征、一场命运的跋涉，是一次伟大的“航程”。小说让读者看到英雄是如何在“路上”获得成长的，忽必烈从历史名词中走出，成为一个可以被读者感知、理解甚至共情的鲜活人物

长，承载了时代主题与历史命运，传奇因此有了重量。

长，承载了时代主题与历史命运，传奇因此有了重量。史诗小说在语言上常具庄重感。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笔势雄劲，写战事磅礴、命运苍凉与山河壮阔，更写历史深处的沉默与悲悯，尽显辽阔的史诗气象。作家以从容笔力引领读者跟随历史人物，从草原到中原，从北境到南国，山河铺展，历史奔涌，一代帝王建立“仁人天下”的宏伟主题铺陈而出。小说的宏阔感并不是靠宏大的战争场面来烘托，而在于把汗廷权力、兄弟关系、蒙汉互动、西南诸族、大理旧臣等多条力量线条编织成复调结构。每一场行军、会盟、亲和与攻守，都牵连着更大的政治秩序和文明想象，笔力磅礴，大势尽显。书中多处描写与对白充满哲思，似在提示人们：历史不是抽象的年代更替，而是山河震荡、众生入局、英雄自我淬炼的过程。

真正的历史小说，贵在于让旧事重新获得体温，让人物从年代的尘埃中走出，带着迟疑、勇毅、孤独与远见，重新站到读者面前。《忽必烈：南征大理国》在刀兵与风雪、谋略与仁心、征服与安抚之间，写出一个时代的伟岸背影，历史因此不再是冰冷的纪年，英雄也并非只在攻城略地时显影，更在他望向天下、承担天下时，真正完成的自身。

（作者系辽宁省文联副主席、省评协主席、东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）



■第一感受

真正拥有「她的宇宙与自然」 展现温柔的壮观

□张莉

2025年8月30日，我到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做名为“她的大自然”的讲座。这是“皮皮乐迪·里思特：掌心宇宙”展览平行讲座“她的宇宙”系列活动第一讲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方式进入艺术世界。皮皮乐迪·里思特的作品中充满了浓烈的女性气质，色彩温柔而大胆，尤其是在对粉红色的运用上。走进展厅，我伸手触摸那些布料，跟随光影的流动。忽然，出现了一个小女孩，我看着她在海滩上行走，在水中游泳，在森林中穿行，甚至延伸到了宇宙。我用手触摸，去感受光与影的交错，真正体会何为“掌心宇宙”。通过想象，把原本看似无关的宇宙世界与我们重新拉近，得以看到一个小女孩如何与遥远的宇宙建立联结。在进入核心观赏区时，我将头伸出了装置的一角，看到了更广阔的宇宙，仿佛自己置身于空无一人的宇宙空间。那惊愕而又恍惚的一刻，让我明白为什么要去美术馆看展览，而不是仅通过视频观看。因为只有在那样的空间里，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拥有自己的宇宙、自己的大自然。

这些年来，我之所以一直倡导“新女性写作”，正是希望女性写作者的目光辽阔。此前，我们谈论女性写作，往往会强调她们在两性关系、婚姻、家庭等方面的书写如何尖锐、独特。这种分析和阐释，旨在让我们了解女性写作的价值，但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大众对女性写作的理解面向——提到“女性写作”，总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，那是长期以来学术研究的话语建构的结果。这也是我那天的讲座以“她的大自然”为题的原因。“她的大自然”中的“她”，指的是女性的宇宙——女性作家眼中的自然世界，以及她们如何重新拥有她们的大自然风景。我以为，当写作者心中真正拥有她的大自然或者宇宙时，才能够超越既定的语法，创造出新的表达，开辟出新的可能。

她和她笔下的自然风景

关于“她的大自然”，我想到乔叶的《宝水》，难以忘却那里的乡村风景。小说中有诸多关于太行山风景的描写。其中有一段我非常喜欢：“野杏花跟着漆桃花的脚步，开起来也是轻薄明艳，只是花期也短，风吹一阵子就散落了。和它一起开的山菜萸花期却长……风再吹它的甲也不落。”这是花朵的力量感，这力量感固然是植物本身所具有的，但也是作家的理解。《宝水》中，大自然的风景与村民的生活紧密相连。小说写到，村里的女性们热衷于开抖音，通过短视频改变生活。有的模仿歌曲对口型，有的拍村庄雪景、桃花盛开的场面。这些农村女性非常了解城里人爱看村里的山、水、树、花，她们互相提醒，在镜头前要穿得更乡土，显得淳朴。她们以“利用”大自然的方式“创造”大自然。从《宝水》可以看到，今天的农村女性如何通过视频制作使乡村成为美景，也可以看到她们正在经历看不见的精神变革。

如果说乔叶有《宝水》，那么李娟便有《我的阿勒泰》。真正到过阿勒泰，或者去过新疆，就会知道现实并不总像李娟笔下那样诗意。可是，为什么李娟写出的阿勒泰却如此动人？原因在于她与当地人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联结。这样的联结恰恰让大自然有了温度。李娟通过与母亲、外婆以及当地人的互动，建立起了她的阿勒泰风景。书中经常出现母亲与外婆的形象，她们与阿勒泰的哈萨克族、维吾尔族居民保持着亲密互动。母亲不会说哈萨克语或维吾尔语，却能凭借热情和幽默，与当地人沟通自如。比如，一个年轻人来小卖部买东西，两人通过暗号和玩笑便能心神领会。

事实上，李娟自身也具备一种幽默感，她能把日常生活中平凡甚至无聊的细节写得充满趣味。她的文字中常常有壮阔的风景，如“无论如何，春天来了。河水暴涨，大地潮湿。巨大的云块从西往东，很低地，飞快地移动着。阳光在云层间不断移动，把一束束明亮的光线在大地上来回投射。云块遮蔽的地方是冰凉清冽的，光线照射的地方是灿烂温暖的”。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，正是因为它把人与自然、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写得既遥远又切近。她的语言简洁、澄澈，辨识度极高，放在任何语境里，都能让人一眼辨别出来。李娟建造了属于她的大自然，那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风景。

与前面两位作家风格不同，杜梨有着长年的野外观鸟经验。《当我成为一只真正的亲鸟——孕期观鸟笔记》中，她记录了一位年轻女性在孕期观鸟的生活体验。在这篇非虚构作品里，她不仅描绘自然，还在思考着什么是人，什么是鸟。一如杜梨在文中回忆，她曾看到有人用绳子拴住黑头蜡嘴雀的脖子，让它们唱歌或表演。这情景令她久久难以释怀，始终牵挂着那只鸟的安危：“老北京玩鸟的人会拿绳子拴着黑头蜡嘴雀的脖子，让它们站在绳子上弓着腰，唱好听的歌儿，或抛出弹丸让黑头蜡嘴雀接住……那只雄鸟脖子上的绳结，始终让我提心吊胆，生怕哪棵树的树枝挂住了它，将它勒死，或者那紫绳太耀眼，让它被猎食者捉去吃掉。我一直在惦记它，不知它现在是否安好？”

在孕期，杜梨把注意力投向怀孕的小动物。在她的笔下，人类不再是唯一的中心。自然万物都可能成为叙述的焦点。这让我们意识到，新一代青年作家正在以新的方式理解大自然。

书写自然，就是拥有自然

回到那天的展览。看完展览的那刻，感受到一种“温柔的壮观”。我意识到，皮皮乐迪·里思特用她的方式创造了属于她的大自然，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风格。

近年来，我一直呼吁作家进行“新女性写作”。真正的新女性写作，不仅书写婚姻与家庭，也将延展至大自然，延展至人与现实、人与自然、人与宇宙的关系。这是女性文学应有的追求。当然，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女作家没有这样的尝试，而是她们的努力未曾得到真正的关注。我以为，书写大自然，重新思考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，对于文学创作至关重要。因为，书写大自然本身就是重新拥有大自然。当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被重新建立，我们会发现，这不仅是文学与世界、艺术与世界的关系，更是人和世界、人和艺术的根本关系。其实，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大自然，建设自己的大自然。

正是因为想到新女性写作与大自然的关系，我选择了朱婧的《当我绽放时》和草白的《山野如幻》作为2025年度的女性短篇小说及女性散文年选的书名。这些作品都有关女性生活，但在内里，我以为也是人与大自然、人与宇宙关系的书写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从这一年开始，我们的小说年选及散文年选选本都做了精简，这源自我对选本的新定位。新的女性文学年选是以精选的方式遴选这一年度令人难忘的作品，同时也请青年人写下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。我以为，这些轻盈的、辽阔的和自由生长的短篇小说及散文，代表了2025年女性文学创作的崭新收获。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■新作快评

南翔短篇小说《点睛》，《作品》2026年第3期

中年之后，如何爱情？

□季俊峰

在人工智能呼啸而来的时代，艺术创作如何保持不可替代的独特性？作家南翔的短篇小说新作《点睛》，以一个中年重组家庭的情感故事，对这一时代之间进行了意味深长的艺术探索。小说以第一人叙事视角，叙述了深圳的中学老师阿锦与娟子二度婚姻的悲欢离合，塑造了一系列鲜活丰满的都市男女形象，探讨了艺术、婚姻与自由等话题，是一部兼具思想性、艺术性和可读性的短篇佳作。

小说具有多义且富有张力的精神向度。南翔的短篇往往以现代都市为背景，在传统文化、自然生态、情感婚姻、社会教育等多重主题的交织中建构叙事文本，具有丰富的阐述空间和深刻的思想蕴涵。《点睛》中，天性散漫的阿锦辞职专攻肖像画，因画展上现场为人物点睛而声名鹊起，受到众多女粉丝的追捧，引发夫友情感矛盾。在娟子的温柔攻势下，阿锦为笔下所有人物都画上了妻子的眼睛，放弃了创作个性。此后两人的感情世界危机四伏，终于分道扬镳。在朋友溺水的帮助下，阿锦终于找回了自己。娟子也幡然醒悟，以决绝的方式选择了成全。小说借此探讨了婚姻中的爱、信任与自由；娟子以爱之名的掌控，扼杀的恰恰是信任与舒展的可能。“千画一眼”，精准地隐喻了这种情感困境——当所有人

物都被画上一双眼睛，爱情失去了呼吸的缝隙，艺术也丧失了生命力。不止于此，小说还将这一追问延伸至更广阔的领域：阿锦与商业市场若即若离的关系，娟子对电子管“矫情而霸道、不真实、缺乏质感、没有灵魂”的反感，“我”对千篇一律、缺乏灵魂的“AI味”写作的不同认同，这些细节都表明作家对当下时代的深刻反思。小说结尾完成了艺术的反转与意义的升华，坚定地表达了作家对人类美好情感与自由理想的信念与追求。

小说具有创新的审美特质。小说采用第一人叙事视角，“我”以“南老师”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，活跃在深圳文化现场，主持深圳晚八点、《手上风华》新书分享会、参加画展、行走于新疆喀什等地。显然，作家将本人的部分真实经历编织进了小说，在纪实与虚构中自由穿梭，增强了文本的在场感、趣味性和可读性。为了弥补第一人称限知视角的不足，作家让剩水承担了部分叙事功能，如娟子离婚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剩水讲述的，这也使得小说的叙事视角更加立体多元。南翔注重短篇小说叙事结构的完整性，《点睛》以画展起笔，借画展生发矛盾，最终以重办画展收束，完成情节反转与主题升华。小说依托对话、动作、细节塑造人物形象。“我们拉钩吧？说

着孩子气十足地伸出右手的小手指，勾住阿锦的左手小手指”，此处细节尽显娟子的单纯烂漫，而结尾她愤激的言语，则展现出情绪的激烈转变。作品以“眼睛”为核心意象，多次刻画娟子的眼神变化，从含着醋意、满是痛苦到心生怨怒，最终归于淡然，完整展现其心路与情感起伏。

小说兼具丰盈的生活底蕴与深刻的思想内涵。作为学者型作家，南翔的小说不但好读，更耐读，还能让读者不知不觉有了见识。这篇《点睛》里，《道德经》《世说新语》的哲思，苏东坡、张爱玲的诗文，齐白石、鲁迅等人的艺术见解，以及绘画、乐器、音乐故事，都自然地流淌在叙事之中。这些既是经典文化的普及及推广，也是作家艺术观的集中呈现，从侧面呼应着艺术创作与自由的主题。大量经典文本和相关知识的援引，使得文本杂花生树、摇曳多姿，也延展从容舒缓的叙事节奏。正如作者本人所说：“丰盈的生活信息量犹如文学的血肉，而深刻的思想信息量就是文学的灵魂。”《点睛》正是这样一部有血肉更有灵魂的作品。它以一个丰富多样、好看耐读的故事，撑开了丰盈的意义空间，也让我们看见作家一以贯之的知识分子立场和人文情怀。

（作者系南昌航空大学副教授）